

詞源探求與近代關鍵詞研究

沈 國 威^{*}

摘 要

所謂「關鍵詞」即處於某一知識系統內結點位置上的重要詞語，而那些與中國社會的近代特徵密切相關者可稱為「近代關鍵詞」。本文指出：近代關鍵詞作為辭彙體系的一員，一方面蘊含著新詞譯詞創造、普及、定型等近代辭彙史研究的問題，另一方面作為近代觀念的承載者，又反映了東亞接受西方文明的進程，是近代觀念史研究的對象。因此近代關鍵詞的研究必然包括詞源考據和觀念史梳理的兩個方面。這是一項辭彙研究和其他人文科學研究相交匯的跨學科研究。本文對不同研究領域的分野，尤其是語言研究者在觀念史研究中應該起的作用進行了論述，並試圖從《觀念史辭典》編纂的視角出發，對撰寫原則、體例等給予探討。

^{*} 作者現任日本關西大學外國語教育學研究科教授、日本關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研究員。

Research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Word Origins and Modern Keywords

Shen Guo-wei

Abstract

So called “keywords” are important terms that have secured a fixed position within a system of knowledge. Those that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modern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society may be referred to as “modern keywords.” This article asserts that as members of a system of vocabulary, keywords encapsulate such problems as the coining, dissemination and stabilization of new and translated words in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modern lexicon. As a vehicle for modern concepts, keywords reflect the process of East Asia’s reception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and are the object of research in modern conceptual history. As a result, research on modern keywords must incorporate both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origin of words and a close treatment of conceptual history. Such research is a multi-disciplinary endeavor in which lexicon research converges with research from other fields in the humanities.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boundaries between different research fields focusing, in particular, on the role that linguistic research plays in research on conceptual history, while also attempt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ts compilation, to investigate the principles and stylistic format behind the writing of the “Dictionary of Conceptual History.”

詞源探求與近代關鍵詞研究^{*}

沈 國 威

引言

語言學家王力曾指出：

（十九世紀以後的）現代漢語新詞的產生，比任何時期都多得多。佛教辭彙的輸入中國，在歷史上算是一件大事，但是，比起西洋辭彙的輸入，那就要差千百倍。（中略）現在一篇政治論文裡，新詞往往達到百分之七十以上。從辭彙的角度來看，最近五十年來漢語發展的速度超過以前的幾千年。¹

這些包括大量抽象辭彙等學術用語在內的漢語新詞中有一些至關重要的詞語，表達了中國社會不可或缺的核心概念，我們把這樣的詞稱為「關鍵詞」。關鍵詞與一般詞語的區分因學術領域的不同而異，本文將那些與中國社會的近代特徵密切相關的語詞稱為「近代關鍵詞」。近代關鍵詞作為辭彙體系的一員，一方面蘊含著新詞譯詞創造、普及、定型等近代辭彙史研究的問題，另一方面作為近代觀念的承載者，又反映了東亞接受西方文明的進程，是近代觀念史研究的對象。近代關鍵詞的重要性在辭彙史和觀念史這兩種研究中並不一定等同，例

^{*} 《東亞觀念史集刊》第3期起，「關鍵詞報告」欄位由沈國威教授策劃主持，本文是未來「關鍵詞報告」欄位編纂的導論。

¹ 王力：《漢語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頁516。

如「哲學」和「數學」這兩個詞的創制和定型對於辭彙史研究同等重要，但對於觀念史研究卻有著不同的意義。²近年來，近代辭彙史、中日辭彙交流史的研究和以關鍵詞為焦點的觀念史研究取得了長足進步，融合兩種研究成果的《觀念史辭典》編纂也提上了日程。我們一方面需要從辭彙學的角度對近代新詞進行詞源考據，另一方面還需要從觀念史的視角對關鍵詞進行梳理。這是一項辭彙研究和其他人文科學研究相交匯的跨學科研究，研究分野如何？語言研究者在觀念史研究中應該起何種作用？本文試圖就上述問題發表一些粗淺的看法，以就教於大方。

一、從概念到新名詞

十六世紀以降，被稱之為「西學東漸」的知識大移動帶來了大量西方的新事物和新概念，東方用古老的漢字接受西方的事物和概念。概念借助於語言而具形，概念可以用一個說明性或比喻性的片語、短語或一句話來表達，也可以用一個「詞」來表達。使用一個詞（包括既有詞和新造詞）表達一個概念叫「詞化」。³詞化是對概念的命名；現代語言學的一個基本觀點是：語言無優劣之分，不管是科學技術高度發達的社會所使用的語言，還是原始農耕社會所使用的語言，只要有必要，就可以表達任何一種概念，但並不是所有的概念都能實現詞

² 參見沈國威：《〈觀念史研究：中國現代重要政治術語的形成〉書評》，《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37期（2010年9月），頁221-222。

³ 或稱「辭彙化」。在討論這一問題時，我們還常常使用另一個術語「觀念」。「觀念」和「概念」有何不同？這兩個術語對應的英語詞都是“idea”“concept”，概念即語言所包含的意義內容，與語言的形式相對應。形式與內容的關係即「能指」與「所指」的關係，是語言符號系統研究的對象，故語言研究更多地使用「概念」這一術語。筆者的定義是：經過意識形態化的概念是為「觀念」，即只有那些得以編入某一語言社會意識形態體系的概念才能成為觀念。這一過程姑且稱之為概念的「觀念化」。沒有詞化也就沒有觀念化。

化。⁴ 在引入域外新概念時，能否發生詞化要受到各種因素的左右。一般來說，在容受社會出現頻率高的概念比較容易詞化，否則將停留在片語和短語等說明性（非命名性）表達的層面上。外來的新概念在引介初期，如眾多的十九世紀英華辭典所示，常常採取片語或短語說明的形式來表達；片語、短語常常在反覆使用中逐漸凝縮成一個詞，完成詞化。需要強調的是近代社會的核心概念，其詞化常常是強制性的，⁵ 就是說，爲了適應國際社會交流的需要，我們的語言社會不容許“democracy”、“human rights”等概念長久停留在說明性短語的階段上。概念的詞化分爲兩個步驟：一是造詞，二是造詞結果的社會認同。以近代新詞譯詞爲對象的辭彙史研究的第一步是考察西方的新概念如何初具詞形的全過程，有諸如以下等問題：

- （一）詞化的實現，由誰？何時？怎樣完成的？
- （二）詞的完成度，作爲複合詞的內部理據性、詞義的透明度如何？
- （三）與既有語詞的關係，有無繼承和衝突，互動情況如何？

也就是說我們可以從造詞者、造詞法、造詞素材、造詞的時間和空間、新詞的理據、書證等角度討論具體問題。中國和日本是近代譯詞的主要「產地」，在漢字文化圈內，長期以來「漢字」是概念唯一正式的載體，以至於近代以降，漢字以及漢字構成的新詞、譯詞是容受、表達西方新概念的主要形式。在中國，二十世紀之前的很長一段時間裡像顏永京、嚴復那樣的西學、西文功底深厚的中國人是鳳毛麟角，譯詞創造的工作是由來華西方傳教士唱主角的。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傳教士的漢語能力不足於造詞，大多數情況下採用的是西士口述，中士筆錄的方式，西士口述的說明性短語凝縮爲詞，漢譯西書裡的譯詞大都是這樣形成的。在日本，譯詞創造的主力是蘭學家以及明

⁴ 自然語言並不爲所有的概念都準備一個詞，如漢語的「兄」、「弟」、「姊」、「妹」等概念在英語中就是用片語形式表達的。

⁵ 參見沈國威：《觀念史研究：中國現代重要政治術語的形成》書評，頁222。

治時期以後的啟蒙思想家們。這些人儘管他們漢學素養深厚，但漢語終究不是他們的母語。關於譯詞創造的方法，我們的語言接受外來新概念大凡有兩種方法：「譯」與「借」。⁶「譯者迳也」，即使用自語言的有意義的語言成份表達來源語言中的概念。其方法主要有二：一、用既有的語詞「移譯」；二、新造譯詞對譯。前者暗含這樣一個前提：人類具有一個共同的意義體系，或者曾經有過一個共同的意義體系，即意義的「原風景」。有人否定這個前提，主張不可能有真正的「譯」。但是，嚴復則說：「蓋翻艱大名義，常須沿流討源，取西字最古太初之義而思之，又當廣搜一切引伸之意，而後回觀中文，考其相類，則往往有得，且一合而不易離」。⁷所謂的「艱大名義」即表達近代核心觀念的關鍵詞，嚴復對「自由」、「權力」、「經濟」等都作了極細緻、深入的探索。對此，筆者的觀點是：語言的辭彙體系有極大的柔軟性，可以自我調節、自我完善。理論上或許沒有絕對完美的對譯，但是，隨著人、物交流的增加，人類總能找到一個最大的近似值。不然，不同語言、甚至方言的人將永遠生活在誤解之中，這是不現實的。另一方面，人類具有或曾經具有過一個意義的「原風景」的主張也無法全面接受。意義體系的建構與語言文化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說不同語言的人們用不同的方法切割世界，命名世界上的森羅萬象。使用既有詞語「移譯」外域概念需要解決的最大的問題是處於不同的辭彙體系中的某一具體語詞，在概念上、語體上、聯想上都無法

⁶ 「借」即借詞，可分為「借音」與「借形」。借音即音譯詞，而借形如漢字文化圈內的語詞借貸。譯詞的創制費時、費事，嚴復就曾說過「一名之立旬月踟躕」。但譯詞存在著「理據」，易編入既有辭彙體系。相反，借詞簡單、迅速，但是新詞的誕生與概念的移入並不同步。漢字文化圈還有一個獨特的方式：新造字為譯詞。造字方式尤其為傳教士看重。參見沈國威：〈西方新概念的容受與造新字為譯詞——以日本蘭學家與來華傳教士為例〉，《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1期，頁121-134。

⁷ 嚴復：〈與梁啟超書〉，收於王枏編：《嚴復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3冊，頁518。但是，對於一般詞語，嚴復認為只要有一個可以使用的譯名，讀者能夠理解就是達到了初步的目的。再好的譯名也不能避免各種批評。

建立完全的對應關係，不可避免地存在著系統的差異性。也就是說，譯詞與原詞的對應常常僅在於一點，而不可能推廣至整個辭彙體系。⁸任何一種語言的辭彙系統都具有自我調整的機制，可以容受外來概念，重構原有的意義體系，這一切所需要的只是時間。如果不是世紀之交以決堤之勢湧入漢語的日本譯詞，中斷了漢語自然演化的進程，嚴復等的本土譯詞都將緩慢地接受洗禮，最終融入已有的辭彙體系。

在既有辭彙無法對應外域新概念的情況下，譯者採用新造譯詞的方法。王力在談到來自日語的譯詞時說：一些譯詞即使中國人譯也會如此，而另一些詞如果是中國人譯也許不會這樣。⁹這是因為儘管日本也使用漢字造詞，但中日語言類型不同，造詞的方法也無法完全相同。新造譯詞的方法有兩種，直譯（即逐字譯）和意譯。這兩種方法都需要對外語和漢語雙方都有較深的造詣，故在十九世紀的中國運用較少。傳教士們還主張利用古僻字或者新造字翻譯西方的概念，但實踐證明這是一條走不通的路。¹⁰詞化的最先嘗試可以是書籍的翻譯，也可以是辭典類（雙語辭典及各類術語辭典）的編纂。前者向讀者提供語境，後者向使用者提供對譯關係。¹¹雙語辭典中有編纂者即時創作的譯詞，也有從當時的譯籍、著述中收集的譯詞。這就是說，辭典裡的譯詞在時間上是滯後於實際使用的。

「理據」即「物之所以名」，是能指與所指的結合理由。索緒爾

⁸ 例如嚴復指出：英文的“Constitution”是抽象名詞，由動詞“Constitute”派生而來。其本義是組織、建立。不僅可以說國家，也可以說一切動物植物，乃至社會組織。一切有形體之物都可以用。但是現在將“Constitution”譯為「憲法」，就只能用於國家了。故嚴復認為這個譯名並不精確。嚴復：〈憲法大意〉，收於王栻編：《嚴復集》，第1冊，頁239。參見沈國威：〈《觀念史研究：中國現代重要政治術語的形成》書評〉，頁224。

⁹ 王力：《漢語史稿》，頁329-331。

¹⁰ 沈國威：〈西方新概念的容受與造新字為譯詞——以日本蘭學家與來華傳教士為例〉，頁121-134。

¹¹ 《新爾雅》（1903）以及梁啟超計畫的《新釋名》（1904）等大詞條形式的術語詳解辭典則兩者兼顧，這是概念引介初期常見的一種形式。參見沈國威：《新爾雅·附解題索引》（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1年）。

(Ferdinand de Saussure, 1857-1913) 以後的現代語言學的一條基本原則是除了某些擬聲擬態詞以外，單純詞能指與所指的關係是任意的。但近代譯詞主要以複合詞的形式出現，而使用複數既有語言成份創新詞必然發生「理據」問題。理據又可以分為外語詞所具有的「原生理據」和譯者所賦予的「譯者理據」。前者體現了不同語言對世界上森羅萬象的不同把握，這種異質的意義模式通過直譯進入容受語言時，既可以造成某種混亂，也可以引進某些新的表達方式。如蘭學譯詞「植民」、「十二指腸」、「盲腸」等都是饒有興味的例子。譯者理據反映了造詞者（通常是時代的先行者、啟蒙家）的再理解、接受域外新概念時的思維方式，觀念史研究試圖通過對理據的分析，詮釋概念容受過程中的某些重要現象。

書證即書籍上的使用例，是提供新詞譯詞誕生資訊的基本材料，很多研究者堅信一切從首例書證開始。隨著電腦的性能提高和普及，個人或小團隊性的語料庫的建構和使用也越來越廣泛。語料庫可以幫助我們迅速發現書證，但是，漢語由於自身的特點（不像西方語言那樣分詞），收錄漢語歷代文獻的語料庫常常只是一個未作語詞切分和詞性標注處理的文本集合。這樣的語料庫在語言研究上的作用是有限的，¹² 但是可以便捷、迅速地檢索某一範圍的語料中是否存在某一字串（請注意不是詞！），其用例數有多少。因此，建構觀念史研究上行之有效的語料庫的關鍵是收錄文獻的範圍和資料的誤差。關西大學內田慶市教授研製的「近代漢語文獻語料庫」以圖片和文字資料對應的方式保證了檢索結果的準確性；而使語料庫和觀念史研究深度結合，並獲得豐碩研究成果的是香港中文大學金觀濤、劉青峰的研究團隊。金觀濤等建構的「中國近現代思想史專業數據庫（1830-1930）」共收錄了1.2億字，主要文獻群跨度一百餘年。這個數據庫按照近代思想史研究的脈絡以窮盡的方式收錄相關文獻，並從專家的視角對收

¹² 只能提供包含某些字串的例句。單音節成份的檢索由於結果數量太大，常常不具實用意義。

錄文獻做了最適當的選擇。研究者可以在該數據庫中檢索到某些關鍵詞的最初書證（結合大量古典文獻的語料庫，初始書證的確認可以更精確），並追蹤其後的歷史演變。現在，漢語典籍的資料化努力方興未艾，如包括《申報》等大型報刊在內的近代文獻資料庫已經完成並開始試用。研究者可以根據檢索結果對相關語詞進行資料庫所允許的歷時或共時的精密描寫。

二、新名詞的普及與定型

儘管有些詞經過如嚴復式「一名之立，旬月踟躕」的嘔心瀝血，但是造詞只是語詞形成整個過程的一半，任何新詞譯詞還需得到語言社會的認同才能成爲「詞」，即辭彙體系一員，這也是詞與格言、警句、句子的根本不同之處。近代以後風行一時，終被棄如敝屣的新詞、流行詞數不勝數。

考察語詞普及定型的過程，我們必須回答以下的問題：（一）什麼是語詞的定型，如何判斷一個詞定型與否？（二）影響新詞定型的因素是什麼？一個詞穩定地被使用就是定型，反之就只是一個曇花一現的流行詞。例如我們可以說「進化」定型了，「天演」則以流行詞終。但是，這只是一種結果論，回到歷史的現場則無法判斷，或預測哪些詞會定型，另外一些詞將消失。歷時性語料庫所反映的使用頻率的增減是一個重要的指標，但其局限性也是顯而易見的：語料庫無法涵蓋語言使用的整體情況。那麼左右定型的因素是什麼？一個外語詞往往有幾種譯法，爲何最終能定於一尊？尤其在近代譯詞研究中我們會遇到這樣的問題：傳教士或嚴復創制的本土譯詞爲何會被日本譯詞所取代？關於原因的討論主要集中在以下三點：

- （一）外部力量的干預
- （二）譯詞本身的因素
- （三）語言社會的反應

第一點最常見的情況是國家或學術團體推進的術語審定統一工作。在近代國民國家形成過程中這是語言政策的體現。第二點是造詞法或理據上的因素，中日譯詞的交替等就普遍被認為是造詞或理據的優劣結果。例如王國維指出「日人之定名，亦非苟焉而已，經專門數十家之考究，數十年之改正，以有今日者也」。¹³ 王國維舉了很受一部分國人推崇的嚴復的例子與日制譯詞相比較，評論道：“Evolution”嚴譯「天演」，日譯「進化」；“Sympathy”嚴譯「善相感」，日譯「同情」，「孰得孰失，孰明孰昧，凡稍有外國語之知識者，寧俟終朝而決哉」。¹⁴ 王國維還說：「日本人多用雙字，其不能通者，則更用四字以表之；中國則慣用單字，精密不精密之分，全在於此。」所以國人「創造之語之難解，其與日本已定之語相去又幾何哉」。也就是說王國維認為日本的譯名比中國自創的譯名更準確，更符合漢語的發展方向（雙音節詞）。第三點反映了語言使用者對新詞的態度，正如王國維所說對於來自日語的新詞譯詞，「好奇者濫用之，泥古者唾棄之」。¹⁵ 即一方面有人對日本新詞趨之若鶩，另一方面崇尚雅馴的氛圍和對日本譯詞的民族主義情緒也極為強烈。定型與否是上述三種因素合力作用的結果，但是，辭彙研究認為新詞能否得到語言社會的認可，外部力量的強行介入、造詞法理據等原因固然重要，但並不是決定性的因素。從結果上看，政府教育部門審定的術語沒有完全被語言社會所接受；¹⁶ 理據的合理與否也並不決定一個詞的存亡。以嚴復的「天演」和日本的「進化」而論，這兩個詞都曾出現在《天演論》中，嚴復試圖分別用「天演」表達自然的演化，用「進化」表示人類道德的昇

¹³ 王國維：〈論新學語之輸入〉，《教育世界》第96號，1905年4月。收於趙斐雲編：《王國維遺書》，第5冊，《靜安文集》（上海：上海古籍書店，1983年），頁99A。以下引用同。

¹⁴ 我們應該注意，王國維將日人造詞和國人造詞完全等同看待了。其實兩者之間有較大的分歧。這是需要我們認真分析的。

¹⁵ 王國維：〈論新學語之輸入〉，頁99B。

¹⁶ 沈國威：《〈官話〉（1916）及其譯詞——以「新詞」「部定詞」為中心》，《アジア文化交流研究》2008年第3號，頁113-129。

華。從造詞的理據上看，「天演」沒有人為設定的價值取向的含義，要優於「進化」。¹⁷ 但是嚴復的「天演」終究沒能抵禦日本譯詞「進化」。又如，廣東近代譯詞如「銀行」、「保險」、「陪審」、「養氣（氧氣）」、「輕氣（氫氣）」等對當時的文人來說或俗不可耐，但也終於保留了下來（不可否認在普及定型過程中有日語影響的因素）。

近代辭彙形成史告訴我們，一個新詞、譯詞能否普及、為語言社會所接受，其決定性因素常常不在語詞本身（即內部原因），而在於該語言社會的認同，在於語言使用者的價值取向（即外部原因）。使用者出於某種原因，對舊詞棄之如敝屣，在任何時代都是存在的。日本譯詞代表了新的知識，其大量湧入是歷史時代所使然，¹⁸ 我們需要找出並準確地記述當時語言社會的諸種因素。¹⁹

三、從新名詞到關鍵詞

如上所述，近代新詞中有一些至關重要的詞語被稱為「關鍵詞」，或「近代關鍵詞」。關鍵詞與一般詞語的區分在哪裡？關鍵詞又是如何形成的？

漢字文化圈的近代新詞是容受西方新概念的結果，這一過程可分為三個階段：即，第一階段十九世紀初葉至中日甲午戰爭；第二階段1895-1915年；第三階段新文化運動時期。第一階段是傳教士造詞，並在有限範圍內傳播的時期。在翻譯內容、造詞方法上，第一階段都不能說取得了成功。第二階段是日本譯名大量湧入漢語的時期，甲午

¹⁷ 例如「盲腸」是進化的結果還是退化的結果？有時人們不得不強辯「退化也是進化」。

¹⁸ 在借入日本譯名的世紀之交，日語的現代辭彙體系幾近完成，就是說，中國得到的是日本意義系統整合後的結果，某些譯詞即使在日語裡也不再是創制初始的意義了。

¹⁹ 參見沈國威：《觀念史研究：中國現代重要政治術語的形成》書評，頁222。

之役，老大帝國敗給蕞爾島國，亡國亡種的危機加深。而在此之前扮演傳播西學主角的傳教士淡出中國政治舞臺，雖有嚴復的孤軍奮戰，終不能滿足中國吸收西方新知識的迫切需要，國人只好將目光轉向日本。留學日本、翻譯日文書籍的熱潮幫助漢語從日語獲得了大量的新詞譯詞，漢語不但從日語接受了新詞，還刷新了舊詞詞義。現代漢語由此迅速完成了辭彙體系的建構，進而實現了書面語的言文一致。第三階段是對新出現的辭彙成份（自造的或外來的）進行整合，使其融入漢語辭彙體系的時期。²⁰ 大量語詞被觀念化成爲關鍵詞就是在被稱爲第三階段的五四期間及其以後的一段時間發生的。

新語詞得到社會認同的過程也可以稱之爲「後辭彙化」。在這一過程中辭彙體系得以整合，原有的意義體系被重組：語言社會賦予新的語詞成份以聯想、語體、評價等周邊義以及意識形態的價值指向。語詞具有體系性，即作爲概念的名稱的「詞」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與其他的詞語保持著這樣或那樣的關係，織成一個意義網路。任何一個詞的出現消亡或意義用法的變化，都會引起該辭彙體系內同一語義場中其他詞語的變動，可謂牽一髮而動全身。所謂的「關鍵詞」在知識網路中處於結點，即語義場中心的位置，一方面作爲外延大的上位詞統轄其他下位詞，另一方面內涵稀薄又依靠下位詞的支持。例如《新爾雅》在解釋「國家」時使用了「領土」、「人民」、「政府」、「文化」、「社會」等詞語。關鍵詞是知識體系的問題，十九世紀傳教士們也作了大量新知識引介的工作，之所以沒能形成關鍵詞是因爲本身並無組織性可言的傳教士的引介沒有嚴格的體系性。關鍵詞的考察不能僅僅針對個別詞語孤立進行，而必須兼顧同一語義場中的其他概念。例如，在討論「民主」時同時將「民權」、「民治」、「民政」、「共和」、「立憲」、「德謨克拉西」等納入視野；「經濟」與「經世」、「計學」、「富強」、「生計」，「科學」與「格致」、「格物致知」、「窮理」、

²⁰ 參見沈國威：《〈觀念史研究：中國現代重要政治術語的形成〉書評》，頁223、224。

「博物」、「生產力」等相關聯，只有在特定的語義場中才能準確地觀察關鍵詞的誕生、普及、定型。²¹

概念的詞化提供了表達上的便利性，也蘊含著概念異化，即名實乖離的危險。我們用一個詞指涉一個概念時，常常忽視了概念的真正內涵及其潛移默化的演變。例如，今天說漢語的人使用鉛筆，利用銀行，卻沒有人留意「鉛」、「銀」的缺位。被觀念化（意識形態化）的語詞尤其如此，人們按照想當然的「觀念」行事，而不是按照思想或嚴格定義的概念去把握事實。「個人」、「自由」、「革命」等觀念在中國語境中的異變引起了研究者強烈的學術興趣；²²「個人」、「自由」、「革命」之所以成為獨具中國特色的關鍵詞不在於它們是“individual”、“freedom”、“revolution”的譯詞，而在於這些術語在中國意識形態體系中的定位，這種定位是以與其他詞語的搭配組合關係體現出來的。²³

四、詞源探求與《觀念史辭典》的編纂

「概念是代號，是思想的出口」，²⁴而語詞則是概念的外殼；沒有概念不足以形成思想，沒有語詞則無法表達概念。由概念到觀念的過程就是近代觀念史的考察內容。我們說的觀念史其實是近代觀念形成史，即東方如何用漢字容受西方的新概念，並建構大同小異的各自的近代意識形態體系的歷史。問題的實質是：「東方如何用漢字容受西方的新概念？」特別是十九世紀以來的中日之間的文化交流和語言接

²¹ 參見沈國威：《〈觀念史研究：中國現代重要政治術語的形成〉書評》，頁224-225。

²² 金觀濤、劉青峰：《觀念史研究：中國現代重要政治術語的形成》（香港：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2008年）。

²³ 參見沈國威：《〈觀念史研究：中國現代重要政治術語的形成〉書評》，頁222。

²⁴ 方維規：〈概念史研究方法要旨〉，《新史學》（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第3卷，頁3-20。

觸使西方新概念的容受及其「詞化」的過程成爲跨語言的事件，這是一個共創共用的時代。²⁵

近代關鍵詞之所以爲關鍵詞是近代觀念史（準確地說是東亞容受西方新概念的歷史）研究的課題，而非辭彙史的內容，並不是所有新詞譯詞都具有觀念史研究的價值；但近代關鍵詞作爲語詞形成的諸種事實則是近代辭彙史的考察對象。對西方概念的傳入、接受過程（其中一部分語詞經歷觀念化）的梳理不等於辭彙史研究，反之亦然，對於關鍵詞的辭彙史上的考察也不等於觀念史研究。但是，以關鍵詞爲考察出發點的觀念史研究必須以辭彙史研究爲基礎。關鍵詞的問題應該放在漢字文化圈來觀察。從世紀之初的各科學術到20年代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思想體系、文藝戲劇理論，可以說整個近代知識體系的建構都與日本知識有著深刻的關聯，即西學從東方來，馬列主義從東方來。考察1895至1915年這一階段的中國觀念形成歷史，日本知識是一個無法迴避的問題。最大限度地利用日本的研究資源，包括相關的歷史文獻及研究成果在內的日本資源會使我們的視角更加全面，這在分析比較東亞各國近代化不同的進程時（共性與個性），尤爲重要，因爲這不僅僅是一個譯詞創制、借貸的辭彙史的問題，而是對東亞近代史的整體描述。²⁶

近代辭彙史的研究往往以新詞、譯詞被大型語文辭典收錄爲終點，但這常常是觀念史研究的起點；觀念史研究更關注術語辭典、百科辭典的記述內容及其變遷。辭彙研究和觀念史研究的融合是必由之路。那麼以收錄關鍵詞爲主的《觀念史辭典》應該如何編纂？筆者曾有幸參與《日本國語大辭典》（小學館，20卷改訂版，2000年）「語志欄」的編寫工作。²⁷《日本國語大辭典》出版於70年代初，是日本

²⁵ 沈國威：《近代中日詞彙交流研究——漢字新詞的創制、容受與共享》（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

²⁶ 沈國威：《時代的轉型與日本途徑》，收於王汎森等編著：《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7年），頁241-270。

²⁷ 沈國威：《辭典的詞源記述及詞源辭典——《日本國語大辭典》的語志欄

容量最大、最具權威的國語辭典。詞條釋義對詞源一般不加涉及，只對個別特殊的詞以「補注」的形式給出詞源方面的有關資訊。進入90年代後，舊版增訂的工作正式展開，增訂版的具體工作是：根據20多年來日語辭彙的變化，增補新內容，改寫詞條。而其中最重要的一項變動是增寫「語志欄」，即對一部分詞的來龍去脈（詞源）進行疏理。「語志欄」撰寫工作由日本大阪大學前田富祺教授總負責。前田教授不主張使用「語源（詞源）」一詞，而用「語志」代之。前田教授認為，「語源」是個有爭議的概念，容易混進詮索「詞之理據」等現代語言學必須加以摒除的民俗語源上的成份，而「語志」只意味著一個詞有據可考的歷史。也就是說，描述的重點不是詞的成詞之理據，而是成詞的過程以及成詞後的使用情況、語義變遷等內容。古日語沒有文字，借用漢字書寫，詞源，或者說某些詞之間的關聯不易尋覓（這一點與漢語辭彙不同，四千年以前誕生的漢字，即使在語音發生了極大的變化的今天，也能為我們提供某些詞源上的線索）。因此避開「語源」，專談「語志」在方法論上是可取的。當然，近代新詞有它的特殊性，似不能一概而論。筆者負責近代漢字新詞部分的編纂，茲試譯若干樣條以資介紹。

病院：釋義部分略。〔語志〕首見於耶穌會士艾儒略的《職方外紀》（1623）。明末清初的漢譯西書是江戶時代日本蘭學家的必讀書，《職方外紀》也在日本廣泛流傳。「醫院」等介紹西洋新事物的詞，即由此傳入日本。最早用於《紅毛雜話》（森島中良，1787），明治維新前後，福澤諭吉等介紹西方的著作中也有使用例，並被收入《和英語林集成》（1867），成為“hospital”的譯詞，其後逐漸普及。但是，當時負責主持東京大學醫學部的佐藤尚忠認為，「病院」不符合漢語的造詞法，建議使用當時中國使用的「醫院」。許多大學的醫學部贊同

佐藤的意見，而稱「XX 大學附屬醫院」。1948 年法規規定，病床數在 20 張以上者稱「病院」，低於此數者稱為「醫院」，「病院」一詞遂最後定型。中國十九世紀以來“hospital”稱「醫院」、「醫館」、「施醫院」等，現在漢語中「病院」只出現在「結核病院」這樣的合成詞裡。

哲學：釋義部分略。〔語志〕日本明治期新譯詞，西周在《百學連環》（1870 年的筆記）中說「將哲學 philosophy 命名稱之為理學，或窮理學」。西周還試用了「希哲學、希賢學」等譯名。《哲學字彙》（第 3 版，1912）的編者在回憶這段歷史時說「西周譯利學說曰，哲學即歐洲儒學也，今譯哲學，所以別之於東方儒學也」。由此可知，「哲學」原為西周區分西方的“philosophy”和東方的儒學而創制的新詞。其後成為東西方哲學的統稱。「哲學」後被收入《哲學字彙》（1881），並迅速普及。《時務報》上有「哲學」、「哲學家」的用例，二十世紀初「哲學」已經成為中國盡人皆知的普通詞了。

《日本國語大辭典》的「語志」是為日本讀者撰寫的，並不適合漢語讀者，其內容也偏於辭彙歷史的考證。《觀念史辭典》應該與之有所區別。這樣一本辭典至少應該包括詞源探求和觀念形成的兩個部分。詞源探求有三項工作，第一是書證調查；第二是根據上述的書證調查，對新詞的發生、流傳、普及、交流進行記述；第三則要對新詞從語義的角度加以描述，主要有中日之間在語義、用法上的異同，以及產生這種不同的原因等。觀念史部分主要對西方概念的引介以及在接收方的異化進行考察，這更多是歷史學家或人文學科研究者的工作領域。沒有人會懷疑任何一個關鍵詞都能寫成一本觀念史研究的專著，但是以一般讀者為對象的《觀念史辭典》每個詞條不宜超過 5,000 字。以「科學」為例，詞源探求部分的記述體例可大致如下（由

於篇幅限制，具體書證等暫從略)：²⁸

(一) 日本：

1. 「科學」之前的表達詞語
2. 西周 1872 年「科學」的書證
3. 中村正直 1876 年「科學」的書證
4. 《哲學字彙》1881 年「科學」的書證
5. 1881 年以後日本雙語辭典、術語辭典、國語辭典等的記述情況

綜述：《哲學字彙》最終明確地建立了「科學」=“science”的對譯關係。此後，「科學」逐漸為日本社會所接受，成為“science”的標準譯詞。進入明治二十年代後（即 1887 年後）「科學」成為日本社會的流行詞，但是從日本辭典類的釋義上看，此時的「科學」意義仍偏重於自然科學，反映了當時的日本社會把科學與哲學對立起來的理解傾向。

(二) 中國：

「科學」之前的表達詞語（尤其以嚴復為重點）

1. 王國維、梁啟超、嚴復等 1898 年起的書證
2. 張之洞等 1900 年以後的書證
3. 1903 年以後術語辭典、雙語辭典、國語辭典等的記述情況

綜述：嚴復最早對“science”做了深度思考，他在《天演論》中主要使用「格致」，《原富》以後開始轉向「科學」，取義「一科之學」。1899 年「科學」首先零星現身於與日本知識有關的文獻中，進入二十世紀以後則蜂擁而入與當時中國社會較為一般的理解「一科之學」的意義發生互斥，並最終取而代之。嚴復為「科學」注入了科學

²⁸ 沈國威：〈嚴復與譯詞：科學〉，《翻譯史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 年），第 1 輯，頁 114-137。

之所以為科學的含意，可以說嚴復的譯詞轉換有著更深刻的觀念史上的考慮。但需要指出的是，嚴復始終沒有放棄用「學」來指稱整個人類知識、學問體系的努力。例如，1909年起嚴復任清學部審定名詞館總纂，主持審定了近三萬條科技術語。對於“science”，該委員會所選定的標準譯詞（即教育部審定詞）是「學」；列於第二位的「科學」只是作為廣泛使用的新詞介紹給社會而已，嚴復等審定者們對「科學」顯示了保留的態度。²⁹

從上面可以看到詞源探求實際上很難和觀念史方面的內容嚴加分割，而中國近代科學思想的普及、科學萬能的流行、科學和啟蒙運動等問題的考察，辭彙史研究者是無法勝任的。《觀念史辭典》應該為整合語言及其他人文科學研究資源提供一個有效的平臺。

（責任編輯：蔡嘉華）

²⁹ 沈國威：《〈官話〉（1916）及其譯詞——以「新詞」「部定詞」為中心》，《アジア文化交流研究》2008年第3號，頁113-129。

徵引書目

- 方維規：〈概念史研究方法要旨〉，《新史學》，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第3卷。
- 王力：《漢語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58年。
- 王國維：〈論新學語之輸入〉，《教育世界》第96號，1905年4月。收於趙裴雲編：《王國維遺書》，第5冊，《靜安文集》，上海：上海古籍書店，1983年。
- 沈國威：〈辭典的詞源記述及詞源辭典——《日本國語大辭典》的語志欄簡介〉，《詞庫建設通訊》第18期，1998年12月，頁1-10。
- 沈國威：〈時代的轉型與日本途徑〉，收於王汎森編：《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7年。
- 沈國威：〈《官話》（1916）及其譯詞——以「新詞」「部定詞」為中心〉，《アジア文化交流研究》第3號，2008年，頁113-129。
- 沈國威：〈造新字為譯詞與西方新概念的容受——以日本蘭學家與來華傳教士為例〉，《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1期，頁121-134。
- 沈國威：《近代中日詞彙交流研究——漢字新詞的創制、容受與共享》，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
- 沈國威：《新爾雅·附解題索引》，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1年。
- 沈國威：〈嚴復與譯詞：科學〉，《翻譯史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1輯。
- 金觀濤、劉青峰：《觀念史研究：中國現代重要政治術語的形成》，香港：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2008年。
- 嚴復：〈憲法大意〉，收於王栻編：《嚴復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1冊。
- 嚴復：〈與梁啟超書〉，收於王栻編：《嚴復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3冊。